

追思民主斗士鲍彤好友

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引子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因受连累而入狱最高地位的中共高官是鲍彤先生。他是中共中央委员，曾辅佐赵紫阳总理执政。他于1989年5月28日关入秦城监狱，坐牢7年。出狱后坚持奋斗，维权不已。他于11月9日，年过九十，病逝北京。我和他曾有一段知心的交往，现撰文对老友鲍彤加以追念。

生日赠言

11月5日，鲍彤过90岁生日的时候说：“人是天地之间一个非常渺小的历史存在……我的90不90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争取的未来，要争取的今天，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好。”

以上是非常简要贴切的发言，展现了鲍彤先生内心所想，毕生所做之事。十分令人敬佩。我有缘和他结识，交往密切，获益匪浅，是一大乐事。

有缘相逢

一天，我收到友人戴晴的电话说：“你是控烟专家。我要给你介绍一位老烟客，看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协助他脱离烟海，增进健康。我们即将有一个聚会，他要参加，也请你来，和他见面，此君是鲍彤先生……”

就是这一电话将我和鲍彤挂了钩，而后长相往还，直到他过世。

要和他见面，我是有备而往的。我带了一份我前写四本控烟专著的彩印页，吸烟代用品的“维尔戒烟贴”，再有，就是好奇心切，信心满满，要会见此一名士，见机行事，一明究竟。

我到达会场，果然看到只有一位先生手持香烟，吞云吐雾，心想这必然是鲍彤先生了。于是挺身而出，自我介绍说：“是戴晴邀请我来的，我要设法帮助你戒烟……”他愣了一下，含笑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咱们以后专门安排见面，加以讨论……”

后来在我持续的鼓励和协助下，鲍先生的确是烟瘾大减，并有一段时间，他是完全拒烟于千里之外了。我很高兴，有控烟妙手在握；可以帮助不少烟客和难缠的烟瘾永别了。

持续交往

我从2006年起开始在北京万寿路中央电视台总部担任英语节目时事评论员的工作。这和鲍先生的住处不远。他住在万寿路军事博物馆对街的一座公寓楼，正北临街一座楼的二层是麦当劳餐馆所在。我和他结识后，就约好每次在中央电视台做完节目后就顺道在麦当劳餐馆和他会面聊天。每次都是他好意点购了咖啡和小吃供我享用。我们聊天大约个把小时，论时情，谈往事，叙家常。天南地北，兴之所至，畅所欲言，一吐为快。我还做了三次录音，珍藏至今。2018年我返美定居后，每隔一段时间，一定和鲍君通话，互报平安。

鲍先生经历丰富，观察敏锐，曾介入中共高层，和我交谈时便可细细道来，侃侃而谈，对我是广开眼界，一大享受和心灵滋润，无限甜美。

当然，我们每次在餐馆会面都有一个尾巴影随，那就是公安部门派遣跟踪的保安人员。我每次都打电话和鲍先生约见，他们都窃听了电话，有两人及时进入餐馆的一角坐下，直到我们谈话完毕，离席下楼，他们才任务达成，相继回返。这帮人分班执勤，每天24小时驻守鲍寓楼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不去鲍家造访，以免多添麻烦。为了要全天候监视鲍彤行动，这笔安保的投入花费很大。还记得有一次蒋彦永大夫派车去接鲍彤前往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我加入此行。我们所乘汽车后一直有跟踪车随行，我还童心未泯似的探出车窗为跟车摄影取证。而鲍彤坦然视之说：“他们是奉命行事，十分辛苦，不必计较。”

再有，鲍君1997年返家定居后，有若干年，每逢六四敏感时期到来，鲍氏夫妇就受到特别款待，要护送到北京以外享受封闭式“旅游”几天。这是当局用心良苦的安排。

鲍彤自述

鲍先生谢世后，其子鲍朴以“坦荡怡天寿”为题，发表了纪念他父亲的文章。我细读了全文，有以下的领悟：

一、鲍君修身的启蒙来自其父教他读“孟子”。他说：“孟子使我懂得，人应当把别人当人；谁把别人不当人，谁自己就不配成为人。”

在我和鲍君的多次面谈里，他确切



鲍彤(网络图)

指出，把人当人，和把人不当人的两极对立人物，前者是赵紫阳，后者是毛泽东。言及为人之道，他又说：“有了孔孟庄，如何做人就清楚了。”这是强调，孔子、孟子和庄子的言行是世人如何做人的表率。

二、鲍君加入共产党的引力有三。一是，他早年阅读共产党言论的著作，如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影响。二是，近朱者赤。他自称：“1946年冬天，我最初接触到共产党。那时，我身边最好的同学都是亲共的，有的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

共党早年以土地改革，维护工农为号召，和国民党的老大松散形成对比，对许多热情奔放，思维敏感的青年都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这包括不少国民党要员的子女。例如鲍君1949年参加中共华东局组织部时的同事顾慰庆，他是抗日时期国府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之子，东北名士高惜冰之子高而公那时已是共产党员。而令人伤感和悲痛的是，这些意在救国的人士在中共建国后的诸多运动里大多被冠以“出身不好，潜伏分子”之罪倍受迫害，悲剧收场。不少1950年代初海外返回祖国报效的学者专家们也遭受类似命运。

三是，鲍君认为，“中国的希望在民主，国民党搞不了民主，民盟力量太小，共产党有力量。”他在2018年至2020

年的鲍彤口述里说：“我接受共产党是自觉自愿，是以一种追求的方式加入共产党的。”

三、渐行渐远：鲍君初入共产党参加工作的感受是良好的。他说：“我从1949年7月进入华东局组织部直到1954年初……到华东的组织部，我很兴奋，一是觉得自己在讨论国家大事了；二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自由讨论，没有任何禁忌，甚至可以提出毛泽东也不代表共产党。”

他的作风也是实话实说，在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他就卷入了“反右派斗争”。自称，“组织上要求交代有没有右派思想和右派言论，我的回答是：有，我对所有右派都同情，同他们的言论都有共鸣。”这一直言不讳的后果是：“1957年8月从我回来以后就开始挨批。”

1958年“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放农业高产“卫星”，处处造假。鲍君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我知道十亩地的水稻被移栽到一亩地上，过5天后收割，计产量。这种弄虚作假是歪风邪气，在当地老百姓当中影响不好，也败坏了我们党大跃进的名誉。”得到上峰的指示是：“你反应的情况是不真实的。情况都已经清楚了……不要再提了。”

(下接第A8版→)